

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

(13)

师东兵(著)

# 古都春寒

真诚奉献

续篇  
2

××××出版社

# 目 录

(章回标题为编者拟)

- |                |               |       |
|----------------|---------------|-------|
| 一 批海瑞江青掀风浪     | 细思索彭真寻良方………   | (1)   |
| 二 王力向彭真提建议     | 康生见主席探虚实………   | (8)   |
| 三 江青插手部队文艺     | 林彪会前暗授机宜………   | (17)  |
| 四 为虎作伥春桥卖力     | 开场“放炮”江青发威……… | (23)  |
| 五 林彪欲整垮罗瑞卿     | 江青施援手相勾结………   | (30)  |
| 六 批黑线“火药”味浓烈   | 谈情况话语含“杀机”……… | (37)  |
| 七 关锋提“要害”遭制止   | 胡绳作说客不投机………   | (48)  |
| 八 看电影江女皇造势     | 摸底细陈伯达钻营………   | (53)  |
| 九 护真理田家英力谏     | 拒忠言毛泽东变脸………   | (59)  |
| 十 回顾经历江青“亮拳”   | 细数“罪状”春桥助威……… | (65)  |
| 十一 探风声周扬欲摸底    | 兜圈子春桥捉弄人………   | (71)  |
| 十二 关锋呈密信作阶梯    | 江青奉“圣”旨查缘由……… | (76)  |
| 十三 听汇报萧主任坦然    | 闻风声陆部长思危………   | (81)  |
| 十四 关锋告密领袖震怒    | 秘书遭殃总长临祸………   | (89)  |
| 十五 座谈会江青定调子    | 批总长林彪除后患………   | (94)  |
| 十六 罗瑞卿梗直遭软禁    | 谢富治圆滑当说客………   | (104) |
| 十七 修改“纪要”江青督阵  | 无中生有伯达捉刀………   | (112) |
| 十八 功臣挨批是非颠倒    | 战友反目恩将仇报………   | (122) |
| 十九 陆定一夫妇逢厄运    | 毛泽东亲自改“纪要”……… | (130) |
| 二十 众秀才上海再改稿    | 毛泽东拍板先“放炮”……… | (137) |
| 二十一 罗瑞卿血溅囚禁地   | 周恩来巧妙避漩涡………   | (145) |
| 二十二 闻罗死谏领袖发怒   | “纪要”三改终出笼………  | (155) |
| 二十三 删“要害”田家英惹祸 | 告恶状陈伯达投石………   | (163) |

二十四	贺龙设宴款待“诸侯”	众将大意轻视“纪要” ……(169)
二十五	批“提纲”毛泽东挂帅	列“罪状”众秀才上阵……(174)
二十六	阅“纪要”彭真闻血腥	撤“提纲”总理再施压……(181)
二十七	康生密召关锋面谈	“红旗”再批“海瑞罢官” (188)
二十八	拟“通知”伯达乱上纲	批彭真林彪讲历史……(194)
二十九	为避祸严慰冰装疯	求和睦刘少奇认错……(200)
三十	起草组江青获实权	常委会林彪定基调……(207)
三十一	两主席议文革任务	众秀才得“尚方宝剑” ……(215)
三十二	毛泽东选定接班人	“南天王”奉召入京城……(221)
三十三	少奇低估中央文革	江青深谙领袖韬略……(226)
三十四	总理批彭陆开重炮	小组会林彪言语粗……(230)
三十五	康生组织舆论“围剿”	彭真失势被迫检查……(237)
三十六	“五·一六”通知获通过	周恩来呼吁保晚节……(242)
三十七	论政变林彪显才华	改机构江青掌重权……(249)
三十八	田家英魂断中南海	书记处进行大改组……(255)

## 批海瑞江青掀风浪 细思索彭真寻良方

一九六六年的元旦一过，首都报刊上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领导文化艺术界的官员们也日益觉得有了压力。批判的锋芒四处飞舞、盘旋、扫荡；占据了学术界的整个空间，而且大大超过了这个特定的范围。不管是不是不祥之兆，相当一批文化艺术界人士都感到了一股沉闷的政治风云逼近了，逼近了……

陈伯达言词谨慎地向彭真汇报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年十月廿一日同他、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胡绳的谈话及同他个别的交谈内容，重点强调说：“主席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一九五九年被我们罢了官的彭德怀张目的，彭德怀也自称是海瑞。”

彭真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证据不足啊，我们还没有拿到吴晗同彭德怀勾结的证据。”

陈伯达耸了耸肩膀，作了个摊手的姿势告辞了。

月亮透过厚厚的云层露出忧伤的白脸，她像害了伤寒病似的低眉垂首，在万道波纹般的云海中艰难地移动。黑乎乎的云朵跳

跃着，翻滚着，在寒光熠熠的蓝天里横行。过了一会儿，薄纱般的云层又把贝亮遮住了，晕色迷朦，连近处的建筑也模糊不清了，整个北京像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浮动。

彭真翻开他让秘书找来的文件，再次阅读起来，他爱让自己的思绪跟上毛泽东的速度，他十分敬重这位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的批示是惊心动魄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对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关于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上批道：“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党的主席批评的语句是尖锐的，其矛头所向是有所指，还是泛泛而谈，他不知道。不过，他想弄清。

一九六四年四月，文艺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整风，检查问题。五月，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草案，江青得到消息，把报告要去送给毛泽东。六月廿七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下，文艺界的领导人背的包袱够沉重的了。连彭真也难以启唇。解放以来，党的文化艺术基本上变成一团漆黑，党的正确领导还有吗？是不是所有的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人都该清洗掉？他简直不敢设想！

去年十一月底，总参谋长罗瑞卿见到他时，头一句话就说：“老彭啊，顶不住了。我开会路过上海，见到了江青，她头一句话就质问我：‘姚文元同志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各报都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啊？主席的话你们还听不听？’我看再不转载就要把事弄大了，所以当即给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同志打了电话，告诉他姚文元的文章很重要，让他尽快在军报转载。”

彭真当时就有点恼火，但没有发作出来。转载就转载吧，反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批判吴晗已成大势所趋，自己只有因势利导，才能把这场学术讨论不至引向邪路。

果然，文章转载后，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纷纷座谈、讨论、撰文，为吴晗辩护，驳斥姚文元的某些观点。

周扬专程赶来找他，很诚恳地说：“你要为文艺界的老同志作主啊。批评我们犯的错误可以，但一定要分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硬把学术问题往政治上扯，谁受得了。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我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也是从三十年代过来的，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没有经验啊。像姚文元这样提问题，就是置人于死地。”

“可你总不能不让人家讲话呀。”

“如果这样抓辫子，任何人都可以抓一把。”

“你有戚本禹、关锋他们的材料吗？”

“多着呢。”周扬说，“关锋以‘何明’、‘东方明’、‘庆云’的笔名写了大量的杂文，随便抽出一篇都可以上纲上线。”

彭真急切地说：“我已经让人注意搜集他们的材料了，你也帮助我搜集一些。我要把材料亲自报告主席，由毛主席作出决断。”

“关键是那位演员，她在主席那儿尽吹些冷风，弄得老人家对我们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总之，你要报告主席，学术问题一定与政治问题严格分开，不分开，学术思想的斗争就展不开，那怎么能谈得上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周扬说的“那位演员”，彭真知道他指的是江青。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他很巧妙地避开了，和周扬谈起了别的。

周扬原名周起应，一九〇八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才十九岁，正是风华旺盛时期。第二年他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一九三〇年回到上海后，参加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一九三二年重新加入共产党，担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一九三七年离上海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率领延安大学部份人员到晋察冀，出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解放以来党的文化艺术工作与他密

不可分。

彭真隐约听到，他和江青很早就认识，但根本合不来。还在三十年代初，周扬听到蓝苹也是共产党员，曾想利用她扩大一些左翼作家联盟的影响，但江青似乎很看不起他。

“我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鲁迅。”江青很自豪地对他说，“你们到底怎样，我还要看！”

周扬对这位孤傲不羈的女人产生了很坏的印象，在排演话剧《赛金花》时，他和作者商定不同意蓝苹饰主角，把蓝苹激怒了。“你们打击迫害我！你们完全是在搞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她这样骂道。

蓝苹即江青。到了延安以后，他们又碰见了。

在鲁艺偶尔相见，周扬主动打招呼，但江青爱搭不理，说：“你这资产阶级的大少爷作风不改，永远是个红皮白心水萝卜。”周扬听了，也只能低头不语。

一九三八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周扬也和大多数在延安的领导人一样受到邀请来至毛泽东的窑洞参加他的婚礼。婚礼简单得很，没有糖果，没有酒席，也没有任何音乐。周恩来只把新娘叫出来介绍给大家便完了。

当新娘出来时，周扬惊得差点背过气去。

江青，原来作了毛泽东的妻子。

以后，他很少再看见她。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主持文化部的工作，江青名义上成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免不了又要打交道。

江青今天批《武训传》，明天批《红楼梦研究》，既批《清宫秘史》，又批《有鬼无害论》，她一出场总有人要倒霉，总是为了整人。

周扬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于是干出了一连串被江青称之为“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变着法儿反对主席指示”的行动。

这次在上海听取毛泽东对批判吴晗的指示时，江青又一次给彭真打招呼，她说：“你对周扬还是要注意他。他在三十年代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围攻过鲁迅。当时，他和夏衍、田汉、阳翰笙一伙，被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他一会儿污蔑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一会儿又污蔑为“‘左’的宗派主义”。鲁迅曾用他那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淋漓尽致地揭露过他们的丑态。鲁迅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这个‘工头’指的就是周扬。”

彭真对这位女人依然是敬而远之。

都是过去的流年老账，翻腾那些有什么意思？难道还想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他很难理解这位女人究竟有什么用意。

毛泽东在和彭真谈话时，态度要温和得多，他说：“现在看来把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你可以作点调查研究，看看文化部门、艺术部门的最高层，有多少人是有问题的，要具体分清是什么问题，然后区别对待之。吴晗这些人总算一类吧。为什么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总会遇到抵制，这个问题要研究。”

彭真想起来了陆定一不久前才告诉他的事：大约是一九六二年初，江青把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找去谈话，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他们找了几条理由拒绝了。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吴晗还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批判他不告知彭真同志不好吧。”江青把手一扬站起来：“你们不愿批算了，全当我没说！”

但彭真又得到了消息：江青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又把李希凡找去，让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顾虑重重，婉言拒绝了。

彭真有点纳闷，江青部署这么大的行动，为什么要背着书记

处，背着北京市委？背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好嘛，既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潮，那么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谁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批判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决不能顾及谁是哪一方的人。彭真有了主意，措施也就出来了。他要好好抓一下文化革命，争取搞出点经验来，以便彻底或者基本上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谁战胜谁”的问题。

2

## 王力向彭真提建议 康生见主席探虚实

王力大步走了过去，奔向彭真的轿车，从里面取出一只黑色的文件包。然后，跟着彭真进了十六号楼的小会议室，把文件包连同钥匙一起递给了彭真。

“听说你给毛主席送了邓拓、关锋、戚本禹的七篇文章？”王力大大咧咧地开口便问，“还是亲自送到主席手里的？”

“你怎么知道？”

“田家英同志跟我讲的。”王力又问“毛主席没说什么？”

彭真对王力的才干比较欣赏，有关事情也愿意和他商量，就点点头说：“主席只是收起了材料，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王力拍着大腿说：“首长，你要闯祸了，小心人家说你是制造新的‘八司马案件’。反右倾的时候，杨尚昆同志把中央办公厅戚本禹等八个人计划打成右派，毛主席知道后大发其火，说‘想不到我身边就有八司马冤案。’你不知道啊，毛主席对关锋和戚本禹的印象不错啊！这回你把火烧到关锋头上，我预料会出事的，关锋已经给主席写了信。”

彭真沉吟了片刻，说：“我只送了关锋的两篇文章，一篇是

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陈贾说起》，另一篇是五月十九日发表的《疑·谋·断》。按照现在批判吴晗的逻辑，这两篇文章都有问题。”他打开文件包，抽出一份档案袋，取出两篇文章递给王力，“你看看，他关锋究竟是不是在指桑骂槐？”

王力接过来，看那篇《从陈贾说起》的文章里划了不少红红，显然是彭真划出来以引起别人注意的。其中两段是：

“……俗话说得不差：‘贼人自有贼智’。陈贾这个谄佞的小人，也有他‘顺非以谄其上’，借此自己捞一把的‘智慧’。

‘圣贤’也有过错，这本是真理，可是，小人却也会钻空子利用它来文过饰非，利用它来‘顺非以谄其上’。然而，真理毕竟是真理，‘君子’同‘小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是‘过则勿惮改’、坚持真理呢，还是文过饰非、‘顺非以谄其上’。”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很注意识别佞人，警惕着别上佞人的当，不使这班小人参与军政大事。他们知道谄佞之小人对于王室、对于他的阶级，是极不忠实的。所以发现了上了谄佞小人之当，是要砍他的头的。”

彭真见他看完了问：“你说这篇算不算影射我们党连封建统治者都不如？他大谈什么‘君子’和‘小人’，算不算暗指我们党是被‘小人’包围着的党，而听不进去赫鲁晓夫们的所谓批评？”

王力说：“我看有些牵强附会。”

“那他们任意攻击吴晗就不牵强附会了吗？”彭真很不高兴地说，“你再看看他的《疑·谋·断》，问题就更多了！”

王力接着看关锋的第二篇杂文：

“……‘断’，确是‘疑而后定’。我看，讲认识论，这句话也是可采的。而第二句话，也可逆而用之，即：无疑从何断起。一个人遇事，如果头脑里不产生问题，眉头也不皱一皱，自

然也就引不起谋虑，因而也就不会有判断，那只能是混沌、盲目、乱撞，而不是什么圣人。”

彭真俯在王力旁边，指着这一段说：“关锋这句话，完全可以引伸为：我们可以怀疑马列主义，可以怀疑毛主席，可以怀疑一切同志们。这就是他的逻辑。你再看这一段。”

王力顺着他的手指往下看：“其实，人们的认识过程都是这样的：疑——谋——断。所‘疑’，就是产生疑问，提出问题。想来想去，考虑哪一个方案合适。这便是‘谋’。经过多方面的谋虑，比较种种设想的优劣、长短和利害、得失，然后作出结论，定出行动或试行计划，这就是‘断’。这是一个开动脑筋的过程，疑，便是这个过程的开始。”

王力看完后，沉默不语。

彭真说：“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违背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程序。我看，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要清理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邪说。”

王力哼哼哈哈应付了几句，没敢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态度。彭真是五人小组的组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书记，还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他惹不起。关锋又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乡，他也不能得罪。更何况毛泽东对关锋的哲学观点一直表示好感，这里面的奥妙很深，弄不好会陷入泥坑里沾一身骚气。

去年年初，他就建议彭真改善一下与关锋和戚本禹的关系，说他们俩实际上和毛泽东有联系，毛泽东有他俩的名单，凡是他们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是要亲自阅处的。开始，彭真接受了王力的意见，将关锋和戚本禹请到家里吃了一顿饭，谈了谈心。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关锋和戚本禹总是对北京市委说三道四，所以他俩和北京市委一些笔杆子们的关系总弄得很紧张，这就免不了彭真要对他们产生恶感。

“不过，关锋是有通天本事的，你还是小心些。”王力再次提醒彭真。

彭真不耐烦了：“我不怕！你总是沉不住气！问题不在有没有后台，而在真理如何。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知道抓住别人政治历史上的节疤整人，我也会抓他们文字上的把柄。如果说错误，那也是错误路线的问题，个人承担不了多少责任。文人硬要打倒，明摆着是横背竹竿穿巷，难通过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互相揭一揭，提高提高认识罢了。”

王力连声说：“我同意。”

彭真又叹了口气：“当文化革命的小组长，难啊！怪不得陆定一不愿意干，这下我才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那还是去年下半年，毛泽东离京前夕，把陆定一、彭真、周扬等人叫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语气温和地说：“看来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结果许多秀才反党。我看不搞文化领域的革命不行，~~马列主义不斗争资产阶级~~，反过来修正主义就要跳出来斗我们。~~中央决定成立管理文化领域的五人小组~~，原来打算让文化部搞，~~看来他们不行~~。是不是陆定一同志挂帅，当组长呀？”

陆定一急忙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来，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啊！我这个人见事迟，脑筋差，我当不了组长，挂不了帅，还是请主席另择他人，以免误事。”

毛泽东的脸色微微一变，沉下来说：“那就让彭真同志兼吧。反正这件事只能办好，不能搞得不疼不痒的来个雨过地皮湿拉倒。”

彭真回来后，抽调了一批干部专门组成班子，成立了个办公室，隶属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这五人小组领导。彭真委托姚溱向下发通知时，他又在“五人小组”前加上了“中央文化革命”六个字，以后的文件便统称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

小组”了。

事后刘少奇听取这个小组的汇报时说：“既然有了这个机构，那就把整个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交给他们吧！”

于是，彭真才挑起了这副费力难讨好的重担。

“王力同志，我看我们还是要整风，即使关锋真正是左派，批一下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吴晗跑到我这里喊冤，我也只是哈哈一顿大笑罢了。左派还能叫批倒？批倒了算我们无能。革命是曲折的，革命的道路漫长而艰险，我看什么事都可能遇到，不要怕别人提意见嘛。”彭真说。

王力此时只是点头：“彭真同志的意见完全正确，我们也只能这样来做什么，否则别人是会骂我们的。现在姚文元的文章就有很多人不满意，称之为‘乱打棍子’。据说伯达同志也不以为然。总之，整人太多了并不好，失掉民心了嘛。”

“这个话你和别人谈过吗？”

“我和胡绳同志和姚溱同志讲过。”

彭真想了想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需要召集一次会议，就此统一一下认识。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一个细致的工作，不作长期的正面宣传不行哪。王力同志，你脑子好使，这样的文章你是不是考虑写一篇。”

这几年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最高领导层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王力明白彭真要阐述的事情太太太复杂了。无法用若干篇文章加以说明，甚至写一本书都说不清楚。此外，如果真按彭真的思路来写，简直等于火中取栗。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江青看了这类东西只会轻蔑地噘着嘴说许许多多挖苦的话，到头来这类的文件终究逃不了付之一炬的下场。王力自己跟着彭真当面应付几句还可以，真正要他白纸黑字地干点事，必须瞄得准些，才能更好地对准目标。他应付地说：“考虑写文章得等大家开了会，有个统一的意见才好呀。不然写出来后，人们七嘴八舌，还是麻

烦。”

彭真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就说：“那就等开过会以后再说吧。反正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不然下面的学术批判就没法进行。”

“其他同志的意见都好统一，我就担心康生同志。”王力有意不往下说。

“康生同志怎么样？”

“他很难说话，而且很固执，弄不好他会反对我们的意见的。”

“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的纪律！”彭真不以为然地说，“只要大多数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得执行中央的文件。都不能脱离中央集体的意志而活动。”

王力丝毫不怀疑，担任中央常务书记的彭真一定能组织一个班子按照他的意见搞出来中央文件。他知道，形成中央文件的方式对他来说是得心应手的，而这正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的意见能够畅通无阻的主要原因。他的这些看法和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人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让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得到党中央主席的认可那就不容易了。他王力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掂量掂量。秀才们总是属于不同的圈子内的。如果他要进这个圈子里，必然要受到那个圈子的排斥，或者要被那个圈子的人所嘲笑。得和失的选择，关键看值不值得。他这样想。

康生负责的小组和机构，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心目中一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而他也是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因为他几乎可以毫无阻拦地接触毛泽东，在党中央主席耳边提供信息，策划谋略，所以好多人都惧怕他。他志得意满、自我慰藉、自我欣赏，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专门审查别人的超级刑侦头子的生活。他在全国各地都建立有自己的联络网点，甚至渗透到中央的最高层。

他能随心所欲地调阅各个部门领导人的档案，一旦有人进入到他的视野里的时候，他甚至会感觉到这个人的颤抖脉搏，然后他便慢条斯理、小心谨慎而又冠冕堂皇地调查他的材料，随后便检查他的经历，最终把他扼杀掉，只留下空空洞洞或乱七八糟的口供、罪名作为证据。

无疑，他是一个干得极其老练而又漂亮的肃反专家，而且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就颇有名气，即使连一些搞专案的老手也对他畏惧三分，他还有极广的社会关系。毛泽东不露声色地把他安排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自然有其深刻的用意。

毛泽东将他召到上海密谈，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但不管他在别人面前怎样傲慢而又自命不凡，在毛泽东面前从来都是彬彬有礼，正式而拘谨。同样，毛泽东在接触普通群众和公开场合下是那样的平易近人，那样慈祥而显得格外亲切，但对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却不是让他们可以随意接近自己。对他来讲，首先主动与人握手就不容易，亲自到门口迎接就更加是一种特殊的荣幸了。今天康生就得到了这种值得大大吹嘘的荣幸事。

“主席，你的身体很好，脸色非常红润，气色是最健康、最标准的。”康生双手合十，然后捧住毛泽东柔软而又宽厚的大手，脸上露出那种谦和而激动的神气。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

“很好，感觉很正常，看来不至于在近几年内见上帝。”

康生注意到毛泽东特有的那种内在的力量，以及超人的自信力。他们坐下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彭真给我送来关锋、戚本禹的材料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们没有研究过。”

“关锋这个人怎么样？”

“我看他的一些哲学文章，印象还可以。”

“他的杂文你们研究过吗？”

康生望了一眼毛泽东满面笑容的面孔，故意不动声色地说：